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张恒龙 姚其林¹

(上海大学 200444)

【摘要】: 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合理增长,使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协调,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从全局、长远的角度去思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对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率,重点在于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提供能力支撑;稳定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支出预期,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增加市场最终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以及不断完善消费环境等。

【关键词】: 居民消费需求 消费率 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20)12-0092-009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已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讲,这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将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次伟大壮举。40 多年来,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对外不断加快开放,充分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并积极引进外资;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发挥低成本、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促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8%提高到 2019 年的 1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27%上升到 2019 年的 17.39%,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需求的扩大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现实需要——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国外层面,2008 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进而席卷全球,其影响至今远未消弭,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增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世界经济自由化在曲折中前进;加之 2020 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国际市场动荡加剧。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种不确定性挑战不断增加。国内层面,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取得巨大辉煌成就的同时,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降低、资源环境约束、人口红利下降等原有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弱化的问题。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增长点正在不断孕育成长,当前我国仍处于新旧动能全面转换的历史关键时期,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着手,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实现集约式发展。在供给侧方面,需要长期从供给侧做好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与供给效率,积极做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有效供给的增加;在需求侧方面,积极发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

¹**作者简介:** 张恒龙,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处长。姚其林,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充分利用好、发挥好、建设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通过需求侧的改革有助于将供给侧改革形成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得到充分释放与发挥,进而促进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最终促进形成供给侧与需求侧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局面。

国内大循环的构建需要扩大内部需求,内需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内需的扩大需要正确处理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从短期看,投资需求的扩大可显著引致内需的扩大;从长期看,内需的扩大最终要靠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来实现。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投资增加带来的产品与服务最终要靠消费需求来消化,消费需求通过与生产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形成。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是实现社会化再生产周而复始的重要动能,也是促进经济系统向更高水平经济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亦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证。消费需求对稳定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扩大内需在优化投资结构、投资总量的同时,更要积极发挥消费需求对内需扩大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现状分析——纵向与横向层面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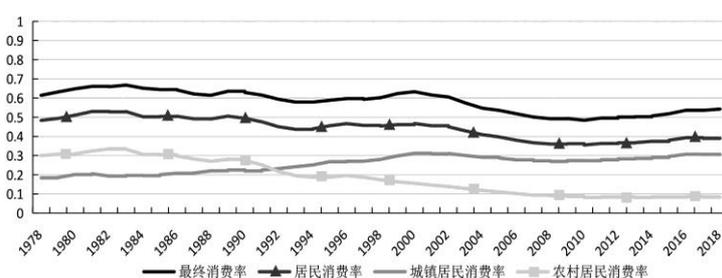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8 年我国各类消费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计算结果整理。

消费率是衡量消费需求的重要指标,图 1 表示 1978—2018 年我国各类消费率的变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由 1978 年的 61.4% 下降到 2018 年的 54.3%,其中最大值为 1983 年的 66.8%;居民消费率由 1978 年的 48.4% 下降到 2018 年的 39.4%,其中最大值为 1981 年的 53%。尽管 1978 年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量在增加,由 1978 年的 1759 亿元上升到 2018 年的 348210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4.1%,但同期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由 3634 亿元增加到 884426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4.7%,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小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因此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就居民消费率内部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率由 1978 年的 30% 下降到 2018 年的 8.4%,城镇居民消费率从 1978 年的 18.4% 上升到 2018 年的 30.9%。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的幅度,所以整体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反差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地区,增加了城镇居民的人口基数,进而表现为城镇居民消费率的显著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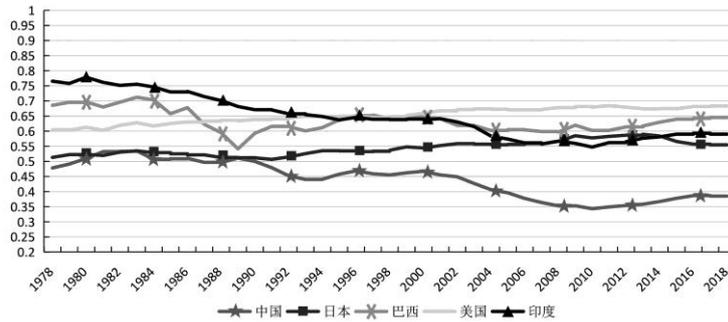


图 2 1978—2018 年中国与其他国家居民消费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整理。

图 2 显示了 1978—2018 年中国、巴西、印度、日本与美国的居民消费率变动情况。总体来看,日本、美国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变动幅度较小,呈上升趋势;中国、巴西、印度新兴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率变动幅度相对较大,呈下降趋势。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横向对比表明,从居民消费率的绝对量视角看,无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还是与发达国家的日本、美国相比,整体来讲处于较低水平,多数年份在 50%以下。从居民消费率的变动趋势看,1990 年以后我国与其他国家居民消费率的差距趋于扩大,且 2002 年以后差距扩大的程度显著提高,2013 年以后又呈减小趋势。

造成这一变动趋势的部分原因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看,可能与我国在不同时间阶段采取的产业发展战略有关。1949—1978 年,我国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发展战略,导致“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1979—1997 年,这一阶段为产业协调发展和纠正前期产业结构失衡的产业发展阶段;1998—2012 年,产业结构呈现重化工业重启的特征;2013 年以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1]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因而 1998—2012 年与 1979—1997 年相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占有相对较大的比重,所以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同样,2013 年以后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居民消费率较 1998—2012 年表现出上升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讲,世界平均的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分别稳定在 77%、60.5%左右,^[2]通过上述分析,无论是自我纵向对比还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对比,均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率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这也说明我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我国居民海外消费不断增加,2018 年据商务部初步估算,我国居民全年境外购物消费约 2000 亿美元,如何将我国居民海外消费回流国内,这对扩大我国居民本国消费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分析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既与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有关,也与崇尚节俭、量入为出的传统习俗有关,更与居民消费能力、居民消费意愿、消费环境等有关。

(一)经济增长阶段

居民消费率的自身变化趋势一般而言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过程相关,在经济发展早期、工业化前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为了进行生产积累,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此阶段居民消费率一般呈下降趋势;在工业化后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投入较前期相对减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此阶段居民消费率一般又呈上升趋势。

(二)供需的结构矛盾

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商品市场已变为买方市场。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的提质升级,供需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失衡方面。相对而言,高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但缺乏有效供给。例如,近年兴起的海外购物热潮,部分反映出有效供给商品与服务的不足;而低收入群体拥有相应的消费意愿,但却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

(三)消费文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东亚地区是高储蓄率经济体的典型,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东亚地区的居民具有高储蓄率的文化背景与历史传统,居民的消费行为往往具有消费惯性,使居民的消费行为受自身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崇尚节俭的文化传统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的消费支出增加缓慢。

(四)居民消费能力与平均消费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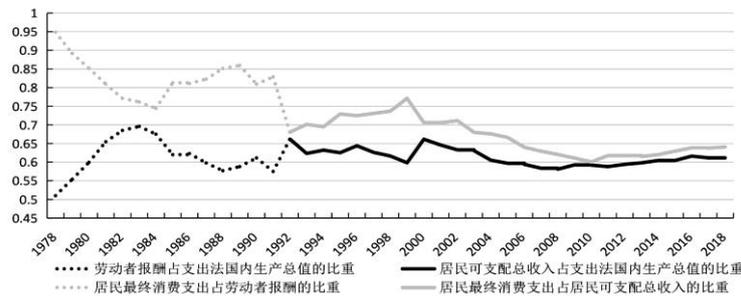


图 3 1978—2018 年我国家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占比变动情况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和 EPS 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结果整理。

图 3 显示了 1978—2018 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劳动者报酬、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我国统计年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部分的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部分),虽然统计年鉴中 1978—1991 年的资金流量表尚未公布,但从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构成看,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包括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和经常转移净收入即再分配收入两部分。

其中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劳动者报酬+住户部门财产净收入+住户部门增加值-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支付-住户部门生产税净额,其中财产净收入主要是居民的利息收入、红利以及其他财产收入减去利息等支出后剩余的财产收入。¹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主要来源于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而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又主要来源于劳动者报酬,因此 1978—1991 年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用劳动者报酬替代。吕冰洋、郭庆旺(2012)^[3]测算了我国 1978—1991 年劳动者报酬占我国初次分配总收入即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据此计算得出 1978—1991 年我国劳动者报酬,进而将图 3 分为 1978—1991 年、1992—2018 年两个阶段来分析。

1. 1978—1991 年阶段

1978—1991 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以及这一时期我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而提高了居民的整体劳动报酬;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劳动者报酬的比重,用以反映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后居民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升高,进而造成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支出减少,同时其下降的幅度略大于同期劳动者报酬占支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程度,而两者之积为居民消费

率,所以该阶段在图 1 中表现出居民消费率呈微弱的下降趋势。

2. 1992—2018 年阶段

1992—2018 年,整体来讲我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均表现下降趋势,说明居民消费支出能力与平均消费倾向均在减小,同样两者乘积为居民消费率,所以该阶段居民消费率如图 1 所示在降低。具体来看,两者在 2000 年前后至 2011 年前后下降幅度较为显著,2011 年以后两者又表现出上升的趋势。

(1)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

1992—2018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的下降,即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居民出于对未来收入以及支出不确定性,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由于不同居民个体在拥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方面存在差别,而不同资源要素的边际报酬不同,随着不同要素间边际报酬的扩大,进而扩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同时城乡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造成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再者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根据库兹涅茨的倒 U 型曲线假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趋于扩大,然后收入分配差距趋于相对稳定,最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的后期收入分配差距又趋向缩小。^[4]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5]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大,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较小,收入差距越大,则整体性平均消费倾向就会较小。

(2) 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92—2018 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的原因可能与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和经再分配后形成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占比下降有关,以及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的降低,居民的投资渠道相对较少,再分配过程有待进一步向居民倾斜有关,具体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角度看,如图 4—图 6。

图 4 所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的变动情况,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65.4% 下降到 2018 年的 61.2%,企业部门由 19.1% 上升为 26%, 上升幅度较大,同期政府部门由 15.5% 下降为 12.8%,所以在初次分配方面,对其变动趋势而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表现出向企业部门倾斜,1992—2018 年初次分配总收入中企业部门占比的升高是造成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居民部门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从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内部构成看,劳动者报酬作为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在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60% 下降到 2018 年的 52%,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可能与企业部门占比增加下的资本挤压劳动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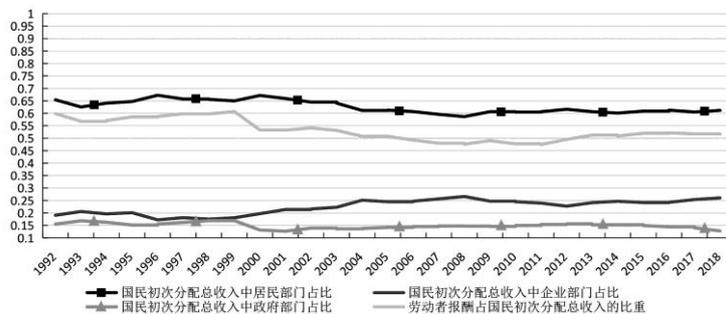


图 4 1992—2018 年我国居民、企业、政府部门和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图 4—图 6 中的数据根据 EPS 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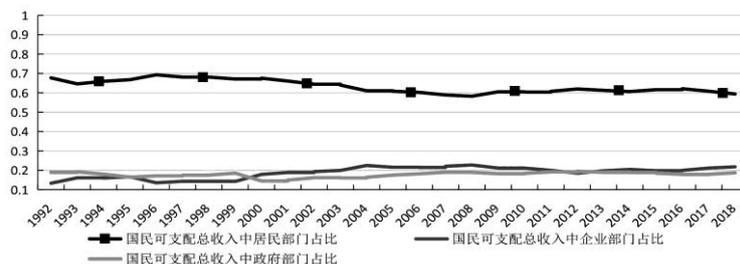


图 5 1992-2018 年我国居民、企业、政府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占比情况

图 5 所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通过经常转移经过再分配后,形成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的变动情况,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之和为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67.7% 下降到 2018 年的 59.4%,且 2003 年以后下降幅度较大;同期企业部门占比由 13.3% 升至 21.8%,上升幅度较显著;政府部门占比由 19.0% 下降为 18.7%。因此经过再分配后,对各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进行纵向对比可得,1992—2018 年居民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同样存在下降趋势,政府部门所占比重相对而言较稳定,同样再分配后形成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向企业部门倾斜。

图 6 所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再分配后的变动情况,各部门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与其各自在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占比相减可得各部门经再分配环节各自在总收入中份额。2002—2010 年以及 2018 年居民部门经再分配过程在总收入中比重的增加量为负值,表明居民部门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与再分配前相比在减小,其余年份为正值,表明居民部门经再分配过程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与再分配前相比在升高,整体来讲居民部门经再分配环节在总收入中比重的增加程度呈下降趋势,由 1992 年的 2.3% 下降到 2018 年的 -1.8%;1992—2008 年政府部门经再分配环节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均增加,且增加的程度在增强,从 1992 年的 3.4% 上升到 2018 年的 5.9%;企业部门在 1992—2008 年经再分配过程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均下降,但下降的程度在减弱,因此从各部门的变动趋势来讲,在再分配环节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倾斜,而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相比其可支配总收入更分别倾向于扩大再生产与投资,进而不利于最终消费率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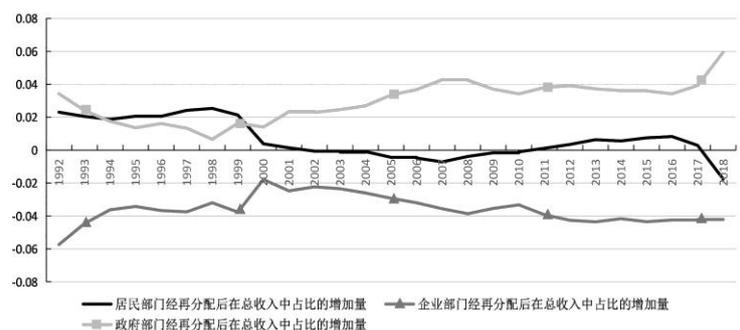


图 6 1992-2018 年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经再分配后在总收入中占比的增加量

(五)消费环境

消费环境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消费潜力的实现,消费环境的完善需要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

等方面。正式制度的安排中,加强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市场监管与惩戒,建设商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提高、扩展消费者维权的效率与渠道;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在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环节,需要增强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意识、道德意识、安全意识,同时需要提高消费者的信任意识,进一步营造高品质、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而这在现实的消费环境中还存有不足。

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着力点需处理好六对关系

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合理增长,使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协调,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从全局、长远的角度去思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对策。居民消费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需要从提高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两个维度出发。具体而言,需要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

(一)将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意愿相统一

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需要提高城乡居民总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从城乡居民内部来讲,中、高等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相比,其收入水平高,消费需求更易受消费意愿的影响,相对而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其消费需求的重要问题,且相对而言农村地区拥有较多数的低收入群体,城市地区占据着较多数的中、高等收入群体,因此,两者比较而言,对于农村居民更需要提高其收入水平,城镇居民更需要提高其消费意愿,政策制定需要兼顾两者,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高的同时,兼顾城镇居民消费意愿的增强;在增强城镇居民消费意愿的同时,兼顾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二)将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与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相统一

生产与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水平的提高离不开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需要健全完善的市场制度与法律体制,通过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以及法律体制的规范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决定作用,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促使拥有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创造更多可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

市场经济在促进要素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的同时,往往伴随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因此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通过降低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促进居民增强消费意愿;可通过提高城乡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改善;可通过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增加。

(三)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相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作为供给侧的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主要表现在: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需要新工艺的运用,居民消费种类的变化需要新产业的培育,居民消费方式的改变需要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创造。新工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的增加,在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增加的同时,还需要从需求侧入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助于全体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助于全体居民购买能力的增强,进而逐步形成为满足需求变化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配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良性协调发展局面。

(四)将加快完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相统一

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效率的提高需要完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当前既要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村居民更加明确现实的财产权利,促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财产收入,还要积极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运行的体制与机制,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居民个人的双赢。

进一步运用好、实现好、发挥好赋予农村居民的产权,离不开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产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良好的产权制度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又会进一步促进产权不断变革完善与前进。县域经济作为联结农村与城市互动发展的重要区域节点,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为农村经济带来巨大的市场与需求,同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体制的不断优化又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加灵活高效的资源要素,进而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撬动县域经济发展,以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进而促进县域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五)将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相统一

通过促进城乡居民在基本民生性服务、公益基础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等方面投入的合理化,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促进发展机会的均等,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环境的改善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为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实现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的土地、劳动与城市的资本、管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有助于提高城乡各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促进要素边际报酬的增加,进而为要素的市场化创造条件。要素的市场化又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双赢。

(六)将优化投资结构与完善收入分配格局相统一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内外部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下,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投资服务于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占比,以促进居民消费环境、消费条件、消费方式的完善与转变,提高投资带动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乘数效应、扩散效应,促进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良性互动,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的意愿。同时,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需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而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以及转移净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组成部分,为此需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积极稳步推进金融业的开放,促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以改善收入的功能分配与规模分配,促进劳动者报酬和财产净收入的增加,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比重的提高,从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参考文献:

[1]郭旭红,武力.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述论(1949—2016)[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1):133.

[2]乔为国.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吕冰洋,郭庆旺.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J].经济研究,2012(10):31-32.

[4]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1-28.

[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注释:

1 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构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9》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部分)得出。